成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七期 2019年12月 頁 57-100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 漢唐文本所見的李陵現象及其生命抉擇

汪娟\*、陸穗璉\*\*

## 摘 要

自漢至唐,涉及李陵的文學作品蓬勃發展。李陵的本事源自《史記》、《漢書》,至《漢書》更為李陵生命定錨,而後有六朝詩文,乃至唐代詩文與敦煌寫卷各類文本的書寫。李陵驍勇善戰,卻戰爭失利;待機報效朝廷,卻遭受誤解,致使至親受戮。究竟是應貪生求榮以降敵,寧死不屈以守節,或者屈辱苟活以報國?這幾乎是千百年來將官與戰士們共同面對的生命課題,因此李陵成為那些掙扎於生、死之際,徘徊於胡、漢之間的文臣武將們,抒發自我的人物典範或參照對象,形成廣泛的同情與批評,因而有李陵現象的產生。本文一一耙梳漢唐之間與李陵相關之歷時文本與共時文本,藉以瞭解這些不同時代、不同文類的文本對李陵的觀點或評價,並深入剖析李陵及相關文本作者們的生死抉擇與生命情懷。

關鍵詞:李陵、李陵現象、生命抉擇

<sup>\*</sup>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教授。

<sup>\*\*</su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講師。

# Li Ling's Phenomenon and its Life Choice in the Related Text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ies

Wang, Ch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Ming Chuan University

Lu, Sui-Lian Lecturer,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Li Ling's literary works flourished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ies, Li Ling's stories originates from *The Records of Grand History* and *Book of Han*, which is anchoring his life, and expand to poems of the Six Dynasties,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Li ling was a good warrior but he failed in the war, he waite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imperial court, but his behavior was misunderstood and cause his families being slaught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 Ling's life, whether to cherish his own life then surrender or fight to the death for the honor, or even preserved his own life disgracefully and then seeking chance to tribute to his country? This is almost a life task faced by generals and soldi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fore, Li Ling has become a model or reference object for the literati and generals who are struggling to live or die, wandering between Hu and Han, expressing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forming a wide range of sympathy and criticism, thus Li Ling's came into being. The essay aim to sort out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texts related to Li Ling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or evaluations of Li Ling from these texts of different times

and categories, and to analyze the life and death choices and feelings of Li Ling and the authors of relevant texts.

Keywords: Li Ling, Li Ling's phenomenon, Life Choice

# 漢唐文本所見的李陵現象及其生命抉擇\*

汪娟、陸穗璉

## 一、前言

現存有關李陵本事的記載,最早附於《史記·李將軍列傳》<sup>1</sup>,乃不及三百字的 附傳(簡稱《史記·李陵傳》),而《漢書》則以二千多字總其事蹟,雖仍是附傳(簡 稱《漢書·李陵傳》)<sup>2</sup>,然不僅能詳盡史遷之意,更為李陵確立歷史地位,其後各史 傳<sup>3</sup>涉及李陵事者,多不出《漢書》範疇。自漢代史傳以來,逐步開展出六朝李蘇贈 別詩、李蘇贈答書<sup>4</sup>,以及唐代李陵相關的詩文、敦煌寫卷等不同文類的文本。

其中,六朝與唐代詩文或以抒情,或以評論為主,唯敦煌寫卷《李陵變文》、《蘇 武李陵執別詞》與《李陵蘇武往還書》5等文本之文類較為不同,三者皆以敘事為主,

<sup>\*</sup>本文據〈漢唐李陵相關文本中的生命抉擇——從《李陵變文》談起〉(西華師範大學主辦「寫本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2018 年理事會」,2018 年 7 月 14、15 日)會議論文重新梳理改寫,並依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修訂完成,特此致謝。

<sup>1</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109,頁2197-2204。

<sup>2</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 巻 54, 頁 1867-1872。

 <sup>3</sup> 如東漢・荀悅:《漢紀・孝武皇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14,頁104-105、《漢紀・孝昭皇帝紀》,卷16,頁114-115、唐・魏徴等纂:《隋書・盧思道從父兄昌衡》(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59,頁1410等等。

<sup>4 《</sup>文選・雜詩上》收錄了〈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蘇子卿詩四首〉,皆為贈別詩。至於《文選・李 少卿答蘇武書》、《藝文類聚》所收三篇相關書信,則有往還贈答之關係,統稱為贈答書。梁・蕭統 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巻29,頁412-413、卷41,頁573-576;唐・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巻30,頁531-533。

<sup>5</sup> 敦煌寫卷《李陵蘇武往還書》(擬題)簡稱《往還書》,內容包含《李陵與蘇武書》與《窮囚蘇子卿謹獻書於右効王閣下》,二文同卷書寫,今存五卷,有:S.173,首殘尾全,尾題:乙亥年六月八日三界寺學郎張英俊書記之也;S.785,首全尾殘,自「蘇武云罪三……」之後破損,無尾題;P.2498,首尾俱全,尾題:天成三年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書記之;P.2847,首尾俱全,多俗誤字,尾題:丁亥年二月三日蓮臺寺比丘僧辯惠末時寫了;P.3692,首殘尾全,尾題: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學郎索福通書記之耳。校訂本據李丹和:〈校訂敦煌本《李陵蘇武往還書》〉,收入杭州大學古籍研

然《李陵蘇武往還書》是模擬李陵與蘇武二人書信往返的對話,內容與史傳故事中李陵、蘇武的立論迥然不同,而前二者則是將史傳故事通過通俗講唱的底本加以呈現,為典型的講史類變文。就《蘇武李陵執別詞》(原題)6而言,全文僅有35行,又侷限於蘇李二人的離別情境,及簡述李陵的心路歷程,不如《李陵變文》來得內容豐富,情節曲折。再看《李陵變文》(擬題)7,它是一篇有說、有唱、有圖為證的講唱變文,內容講述李陵率領孤軍力剋匈奴十萬大軍,因糧盡兵絕而暫降匈奴,實欲以報漢;其後母妻盡皆伏誅,致使李陵報國無門,歸鄉路斷,而有「漢家天子辜陵德」之歎。全文在漢代史傳的基礎下,增添及變造諸多故事情節,清楚呈現李陵一生的遭際與心酸。講唱李陵故事對戰事頻仍的敦煌軍民而言,不僅止於表面的娛樂效果,更能引發邊地戰士的投射心理與共鳴。

自漢至唐的李陵文本中,敘及李陵所面對的人生抉擇偏重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對李陵生平敘述最為詳細的《漢書·李陵傳》,所觸及的李陵抉擇,依其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三:一、敗戰初時,李陵面臨選擇降敵或死節的生死抉擇。二、降敵之後,年餘,武帝誅族陵家,令一心伺機報國的李陵落得不忠不孝之名,在萬念俱灰之餘,李陵首度掙扎於胡漢歸屬與去留的抉擇。三、昭帝派人召陵,面對武帝已崩、罪名難洗的情況,李陵再度面臨是否滯胡的去留抉擇。這三個重要的轉捩點、抉擇與連帶的結果,引發後世同情或批評的不同聲音,也影響後代對李陵是非功過的評價。而六朝,或因文壇代言風氣盛行,又或滯北未歸之人的遭遇,而有為李蘇代言的相關詩文,或居胡未歸、思歸離情等作品出現。時至唐代,不論是相關詩、文、敦煌寫卷,或有承襲史漢之李陵抉擇而書寫者,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撰者表面藉李陵之事,實以澆胸中塊壘而作。

事實上,自漢至唐,涉及李陵的文學作品蓬勃發展,且所形成的「李陵現象」

究所等編:《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291-303。

<sup>6 《</sup>蘇武李陵執別詞》,為求行文順暢,或簡稱為《執別詞》,現存一卷,編號 P.3595,首尾俱全。此卷少有專文研究,錄文詳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202-1206。

<sup>7 《</sup>李陵變文》,為求行文順暢,或簡稱《李陵變》,現存一卷,北圖編號為新 0866 (即 BD.14666), 原卷首缺尾全。錄文詳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128-155。

也愈見明顯,卻未見前賢研究對此有完整的論述。所謂「李陵現象」是指透過李陵的故事典型,包括李陵的個人際遇、曾面臨的思歸情懷、生死抉擇、胡漢歸屬的去留抉擇等諸多面向,形成廣泛的同情或批評,也因而有「李陵們」與「非李陵們」的出現。其中,凡藉李陵遭遇來書寫自己,以投射撰者自身的生命抉擇者,這些撰者可總稱為「李陵們」;又或是不認同李陵的生命抉擇者,則可總稱為「非李陵們」。整體而言,不論是同情李陵,或者是批評李陵,並不止於對李陵個人生命遭遇的關懷,而是事涉千百年來,自中原五胡亂華,乃至於胡漢相爭的邊陲地帶,眾將官與戰士們經常面臨的生命課題(如何抉擇)。李陵的驍勇善戰與戰爭失利的衝突,欲以報漢與至親遭戮的矛盾,生命中充滿不可承受的悲痛與無奈,正好為這些掙扎於生、死之際,徘徊於胡、漢之間的文臣武將們,提供了最佳的人物典範與參照對象。

歷來研究李陵者,多以其平生功過及相關作品的辨偽為主<sup>8</sup>,由於敦煌文獻的發現,使研究面向漸廣,其中,有關李陵變文者以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最具代表性。<sup>9</sup>其後的研究面向,或以考釋、校補為主<sup>10</sup>,又或以主題學為研究取向,並加入比較學、敘事學的觀點者,著重論述李陵故事之情節內容、比較或影響等研究層面,成果不凡。但各家論文多未留意李陵現象的產生,而且史料的採擇多偏一隅,極少援用不同時代的書寫特性(歷時),或同一時代、不同文體所呈現的李陵現象(共時)等多重視角,以研究不同文本間的性質與意義,而本文則兼顧歷時性與共時性

<sup>8</sup> 如劉淑如:〈李陵答蘇武書辨偽〉,《臺北工專學報》6 (1973.5),頁 393-394;方祖桑:〈李陵、蘇武詩的探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11 (1988.11),頁 29-35;章培恒、劉駿:〈關於李陵《與蘇武詩》及《答蘇武書》的真偽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 (1998.4),頁 71-77、142;劉國斌:〈關於李陵《答蘇武書》的討論與判斷〉,《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5 (2011.10),頁 110-112、128;孫尚勇:〈論蘇李詩文的形成機制與產生年代——兼及《漢書·蘇武李陵傳》的成篇問題〉,《文藝研究》3 (2012.3),頁 68-73;丁宏武:〈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論李陵作品的流傳及真偽〉,《文史哲》6 (2017.12),頁 19-40、163。

<sup>9</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頁 55-63。

<sup>10</sup> 如郭在貽、黃征、張涌泉:〈《李陵變文》補校〉、《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 (1991.1),頁 10-14;趙達夫:〈《李陵變文》校補拾遺〉、《甘肅社會科學》2 (1991.2),頁 89-92;胡大雷:〈蘇李詩出自代言體說〉,《柳州師專學報》3 (1994.9),頁 16-18;鍾來茵:〈〈李陵與蘇武詩〉作者探論〉,《漢學研究》12:2 (1994.12),頁 229-243;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臺大歷史學報》26 (2000.12),頁 151-205。

的研究特點,分別深入討論。

要言之,歷時性以自漢及唐李陵相關之文本為研究範疇,而同時代的共時性文本,漢代文本以史傳為主,並兼採〈報任少卿書〉; 六朝文本採用代言體的李蘇贈別詩、李蘇贈答書; 唐代文本採用李陵相關的樂府、詠史詩、邊塞詩文,以及敦煌寫卷等,據此進一步分析、歸納這些不同時代、不同文類的文本對李陵的觀點或評價,特別是以「李陵現象」的新觀點切入,深入剖析李陵及相關文本作者們的生死抉擇與生命情懷,及其對歷代身處胡漢之地、滯胡未歸之文臣武將的影響。

## 二、漢代李陵本事之定錨

本單元以《史記·李陵傳》、〈報任少卿書〉<sup>11</sup>、班固《漢書·李陵傳》等材料,探究李陵其人其事、歷史定位,並剖析李陵內在的生命抉擇。由於漢代史傳是紀傳體的史書,乃史官立於國家的視角,透過散文敘事的書寫形式,記載昌盛強權的漢代王侯、后妃等各階層的人物事蹟為主,故所代表的是正統的歷史觀點,所針砭的史事對後世影響深遠。又《漢書·李陵傳》延續史遷觀點,並詳述李陵本事,可說是為李陵一生定錨。有關史遷與班固的觀點,分述如下:

## (一) 史遷觀點與生命抉擇

《史記·李陵傳》<sup>12</sup>不及三百字,是《史記·李將軍列傳》的附傳,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敘述天漢 2 年陵軍浴血爭戰的過程——「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遂降匈奴。」(頁 2204)之後單于「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十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頁 2204)其餘李陵之事所記不多。

<sup>11</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收入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 卷 41, 頁 577-578。

<sup>12</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卷 109,頁 2203-2204。

雖然結局以「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頁 2204),表面上記載朝廷和士大夫的觀點,但是史遷甘為李陵游說乃至獲罪,其理由則詳述於〈報任少卿書〉中,理由如下:其一,史遷描述李陵是一位「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sup>13</sup>(孝、信、廉、義、讓、恭、儉、忠)的人,褒稱李陵乃「奇士」、「國士」,是國家重要的人才。其二,陵軍處於孤危之時,原有死戰的打算——「(匈奴)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頁 578)足見陵軍原本不惜犧牲生命,是要「死敵」的。其三,「陵未沒時,……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頁 578)說明朝臣對待人才的態度反覆不定,因李陵戰敗而誇大李陵的過失。其四,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頁 578),不但可與「士卒死傷如積」(頁 578)仍「爭相死敵」(頁 578)互相呼應,且與《史記・李陵傳》所描寫的「愛士卒」的性格若合一契,故「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頁 578)其五,史遷認為李陵「欲得其當而報於漢」(頁 578),此役雖無可奈何,然李陵多次摧敗匈奴的功績也足以昭顯於天下。

司馬遷以私人信函道盡他對李陵事件的真實觀點,但於《史記·李陵傳》中卻著墨不多,或因當時消息尚未明朗;或礙於君臣分際所致。然李陵事件對史遷撰寫史實應有深切的影響,此可見於〈馮唐列傳〉之魏尚事蹟。14李長之認為魏尚傳中含有太史公書寫李陵的影子15,蓋取其「臨財廉」、「愛士卒」、「同有軍功,朝廷卻有罰無賞」,而這恰可與李陵事蹟有所呼應,故令史遷深喟不已。甚且,司馬遷細緻地刻畫〈李將軍列傳〉之李廣事蹟,強調李廣將軍「善射、廉、(將兵)寬緩不苛、軍中服其勇」16;還將〈李將軍列傳〉置於〈匈奴列傳〉之前,清晰呈現他推崇李氏將門的忠烈情操,肯定李廣必有制伏匈奴的才能,進一步強化史遷對李陵家世、為人的

<sup>13</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7。

<sup>14</sup> 漢·司馬遷:《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卷 102,頁 2126。

<sup>15</sup>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135。

<sup>16</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卷 109,頁 2197-2203。

判斷。而且史遷記李陵「善射,愛士卒」<sup>17</sup>此又可以呼應〈報任少卿書〉評李陵「有國士之風」<sup>18</sup>、「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頁 578)之內容。

至於深愛士卒的李陵,降敵前所面臨的境況是:「提步卒五千,……抑億萬之師,……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軍士……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sup>19</sup>可見李陵儼然有李廣將兵的英姿。然而,在「陵食乏而救兵不到」的情況下<sup>20</sup>,「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頁 2204)實可推知李陵欲「報陛下」的初心,但若只有戰死留名,而對克敵制虜徒然無功,又豈能為漢皇分憂解難、報效皇恩?依此,李陵內心深處自我期許的「報陛下」、「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應以克敵制勝、解除國難為其人生理想;或許也與其祖父李廣畢生功業未能封侯的遺憾有關,因此,冀望能一展長才,建功立業,臻於人生理想,便成為李陵面臨生死抉擇的重要關鍵。甚且,自我理想的實現與歷史使命的完成,更能突顯自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故「克敵制勝」的抉擇必然更勝於「戰死留名」,因而萌生「暫降匈奴,得當報漢」的意念。順此,屈辱苟活以實現理想的生命抉擇便成為李陵降敵的重要契機,同時呼應史遷所謂:「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sup>21</sup>端視生命抉擇所帶來的意義與價值而定。

史遷著史論事,深受孔子儒學觀念與《春秋》褒貶筆法的影響,字裡行間無不 以實踐「士志於道」、「以忠恕貫穿正道」的思想為經,並以著重人倫情義、不以成 敗論英雄等博雅精神為緯<sup>22</sup>,故〈報任少卿書〉描述李陵深具忠、孝、信、義、廉、 讓、恭、儉、「愛士卒」等儒家典範,進而推其降敵之舉是為了「得當報漢」,並嚴 辭駁斥朝臣、親遊的乖違行逕。另外,司馬遷一方面深褒李陵的為人,另一方面又 著史以「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作結<sup>23</sup>,不可不謂之前後矛盾,無怪乎有

<sup>17</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卷 109,頁 2203。

<sup>18</sup> 漢·司馬遷:〈報仟少卿書〉, 頁 577。

<sup>19</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8。

<sup>20</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卷 109,頁 2204。

<sup>&</sup>lt;sup>21</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9。

<sup>22</sup>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54-116。

<sup>23</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卷 109,頁 2204。

人以為「何云李氏名敗,隴西之士為恥乎!斷非子長筆。」24

值得一提的是,史遷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sup>25</sup>可見二人並無深交,卻能深刻體認李陵不死的無奈而為李陵仗義直言,既遭「最下腐刑」(頁 579)而選擇隱忍苟活,蓋因《史記》「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價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頁 581)足見史遷為了成就一家之言,留文采於後世,期以完成自我的理想抱負,故有雖千萬死亦在所不辭的高遠目標。由此推知,生死抉擇的標準,並不在於「貪生怕死」或「從容就義」的二分法,「屈辱苟活」反而是為了實現更遠大的抱負。<sup>26</sup>就李陵的生死抉擇言之,他可以選擇降敵(貪生求榮)、死節(寧死不屈)或報國(屈辱苟活),從外在的形式而言,降敵和報國一樣是求生,但其目的卻是南轅北轍,而且表現出不同的生命層次;甚且對於仁人志士而言,屈辱苟活比起戰死沙場(守節不屈)反而更為艱難。李陵最終的生死抉擇是屈辱苟活、待機報漢,其生命層次實遠高於貪生求榮以降敵、戰死守節以留名。史遷雖不是李陵的深交,卻是精神上的知己,而其表述李陵為國士之言,可謂惺惺相惜,或許因為兩人的內在價值與人生理想是一致的,屈辱苟活都是為了日後再創新局,故見知李陵的抉擇即是史遷的抉擇,兩者相互輝映。

## (二)班固觀點與李陵定位

雖說班固撰《漢書·李陵傳》<sup>27</sup>時,並未遭遇類似李陵、史遷般的生命抉擇,然 其弟班超投筆從戎、征戰千里、守邊三十一年,班固對於前線戰士面臨的生命抉擇

<sup>&</sup>lt;sup>24</sup>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上海:文瀾書局,1902), 卷 33, 頁 613。

<sup>25</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7。

<sup>26 「『</sup>司馬遷之心』……就是『自乞宮刑,隱忍苟活,完成《史記》,以雪恥揚親,並對自己、對父親、對歷史文化做出交代。』隱忍苟活是忍辱,但不是貪生。……他自乞宮刑以逃死,而宮刑卻是他認為『最下』、『極矣』的恥辱,……甚至自覺失去做人的尊嚴,活得不像人。但他還是選擇如此非人般地苟活下去,認定只要能完成《史記》,『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頁 201-204。

<sup>&</sup>lt;sup>27</sup> 有關《漢書》之後的史傳,如《晉書》、《北史》等,對於李陵事蹟的記載有限,且不出《漢書》範疇,幾以《漢書》內容為主,故其他史傳不另討論。

應不陌生,故於〈李陵傳〉中,除了繼承《史記·李陵傳》和〈報任少卿書〉的觀點以外,更擴充了天漢2年戰役前軍事布局的轉折、陵軍英勇抗敵的攻守氣勢與轉戰歷程,以及李陵降敵前後的處境與心境,還有「上欲陵死戰」<sup>28</sup>、「上悔陵無救」(頁1871)、「上遣公孫敖迎陵」(頁1871)、「昭帝立,……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召陵」(頁1871-1872)等史事,記載內容鉅細靡遺,客觀地增添《史記》之後的李陵史實。不但認同史遷的觀點,呈現對李陵人格的肯定,更將具體文字落實於《漢書·李陵傳》中,而非如史遷一般,僅將其主要觀點撰於〈報任少卿書〉。班固此舉頗有為李陵平反,並確立其歷史定位的意味。

對班固而言,他一方面效仿史遷著史立言,又要創立新的著史格局,發展新的歷史觀,故不僅勇於秉筆直書、弘揚實錄精神,也注重宣揚漢德、反映社會民生,更有惜才愛才的宏觀思想<sup>29</sup>,因此《漢書·李陵傳》<sup>30</sup>為李陵多面向的書寫,可說是重新為李陵的生命定調,其中既有為李陵之冤平反的意圖,又以天意之說為漢武帝開脫,其內容所呈現的李陵生命抉擇如下:

一、關於李陵敗戰後應降敵或死戰的生死抉擇。從李陵敗降前的內心掙扎:「兵敗,死矣!」(頁 1869)「吾不死,非壯士也!」(頁 1869)皆說明李陵原有為國犧牲的決心;「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頁 1869)李陵內心絕望之情溢於言表,自覺「無面目報陛下!」(頁 1869)遂降,說明李陵從就死到敗降之間的心理轉折。班固細膩地描述李陵的心路歷程之後,又記「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頁 1870),更承襲了史遷觀點。「久之,上悔陵無救」(頁 1871),也間接說明了漢武帝認同李陵暫降、欲以報漢之心。

二、李陵欲報求忠,卻遭武帝誅族,使李陵招致不忠不孝之名,因而掙扎於胡 漢歸屬與去留的抉擇中。事實上,投降後的李陵,並未效忠於匈奴,也未與漢為敵, 然卻因公孫敖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故臣無所得。」(頁 1871)

<sup>28</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卷 54,頁 1870。

<sup>29</sup> 陳其泰、趙永春:《班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65-221。

<sup>30</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 卷 54, 頁 1867-1872。

致使武帝誅族陵家。李陵在難以置信之餘,質問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頁 1871)使者曰:「……教匈奴為兵……」(頁 1871)換言之,敗戰並非李陵的過失,亦非陵家被族的主因,李陵是否為單于練兵,才是陵母妻子被誅的重要關鍵,此際,欲報漢而遭誅族的悲痛,成為決定李陵悲劇命運張力的極致。

再者,就李陵事件而言,司馬遷雖屬關係人之一,但當時消息傳訊尚未完全明朗,應以《漢書》的記載為實。故陵家受族應非如《史記》云:「單于既得陵,……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頁 2204)而應以《漢書》記「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頁 1871)以及其後所載「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頁 1871)為據。換言之,班固認為:陵母伏誅,未能歸因於李陵不孝,這也呼應了史遷所言「陵事親孝,與士信……有國士之風。」<sup>31</sup>

三、關於李陵最終是否滯胡的去留抉擇。「昭帝立……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頁 1871-1872),這是李陵最終一次(昭帝時)面臨去留胡漢的抉擇,但卻首次出現於正史中。昭帝派人至匈奴召陵,「陵墨<sup>32</sup>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頁 1872)描述李陵在被誅三族之後,內心仍掙扎於滯胡或歸漢的去留抉擇。即使當朝輔政的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皆「素與陵善」(頁 1871),且故友任立政最後以「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頁 1872)進行勸說,但在武帝已崩、罪名難脫、歸家靡至的考量下,李陵最終還是以「丈夫不能再辱」為由,予以婉拒,其後滯胡二十餘載而終老異鄉。足見李陵的心底仍期望武帝為他洗刷敗降辱國、漢武誅族的寃屈,然此際任立政卻以「無憂富貴」來勸說回漢,將他昔日企望欲報的熱誠磨蝕殆盡。亦可知任立政所謂的「富貴」,並非李陵最終抉擇去留的關鍵因素。

整體而言,班固記李陵曾面臨生死抉擇、胡漢歸屬、去留抉擇等生命情境,而對李陵的描述,除了承襲史遷之意而記「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頁 1871)之外,

<sup>31</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7。

<sup>32</sup> 墨,通「默」。吳澤炎等編:《辭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頁630。

幾無負評,然若以蘇武守節之志為標竿,則不無有「陵下矣!」之嫌。再者,就國家立場而言,建立永恒的制度與綱紀,樹立千秋典範,引領後世臣子竭力效忠,將死戰視為忠君,降敵等同叛國,自有其必要性。所以身為史家的班固,即便對李陵深表同情,仍不免站在官方立場為漢武帝開脫,而將李陵遭遇訴諸天意:一藉武帝曾派兵救援,「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頁 1871);二藉「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33之論贊來解釋李陵兵敗的事件(兵盡糧絕、擊鼓不鳴、投降匈奴、受人誣陷、遭受滅族)皆歸諸於「天命不遂」,而非人為因素(武帝)所致。足見班固一方面基於國家立場,以頌揚漢德為使命,另一方面又多認同史遷觀點、同情李陵遭遇,故以士大夫的視野、儒家的觀點,在正史中還原李陵的初衷,為其平反,並將李陵受武帝誅族而導致不幸遭遇的過程定調為天意所為。

## 三、六朝李陵相關之共時文本

自從班固將《漢書·李陵傳》、《漢書·蘇武傳》並陳於《漢書·李廣蘇建傳》 之後,再加上《漢書·蘇武傳》載及單于藉李陵招降蘇武,蘇武百般受難卻不為所動,而且描述李陵送別蘇武的情景及賦歌起舞之辭:「徑萬里兮渡沙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34後人詩作、書信開始出現李蘇並舉,甚或兩人對比的情況,開啟六朝文本李蘇贈別詩、贈答書的先聲,然其內容多以抒發離情為主。這些代言作品的生發,除了延續史漢對李陵的想法之外,也應與六朝諸多文人滯北未歸、身處胡漢之地的時代背景有關。以下分別論述六朝兩類文本所書寫的李陵生命情懷,

<sup>33</sup> 班固藉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證明陵家受族實因殺伐過多所致,是天意而非人禍。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卷54,頁1879-1880。如司馬遷也有類似的觀點,「(秦二世時),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王離軍遂降諸侯。」《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卷73,頁1838。

<sup>34</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卷 54,頁 1877。

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時代現象。

## (一)李蘇贈別詩呈現之情意摹寫

曹操「魏武三詔令」使用人唯才之說盛極一時,中國進入一個重才、求才的關鍵時代,新思潮衝擊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產生「人的覺醒」,促使個人開展更多的創造力。其中,藉史抒懷的詠嘆作品更是蓬勃發展,而「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開一代先聲,……在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感喟。」35雖然南朝宋顏延之〈庭誥〉早已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李蘇詩並非李陵、蘇武的作品。36然而「東漢至魏時,社會上本有作詩代人立言的風氣。……至兩晉南北朝這種代言體仍有出現。」37這些代言詩大約起自漢末離亂之後,長期的社會動盪、政治紛亂、經濟衰敗,致使家庭隔絕、夫妻分離、人際乖違成為普遍現象,故有當代詩人藉李蘇之名,為這對異鄉孤臣代言的詩作。

這些後人揣摩李蘇的代言詩最早見載於梁·昭明太子《文選》中,多以嘆詠李蘇二人的離情別緒、傷時感物為書寫主軸,藉胡馬、遊子、河梁等諸詞描寫李蘇面對離情的心境,傳達李蘇內心不能自己的悲苦,以及人皆有此情的心聲,頗具樂府民歌性質,也呈現李蘇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共同的意象,成為後世文人用典的重要依據,影響深遠。

之後,李蘇贈別詩陸續增益,足見李蘇事件持續受到關注,至《古文苑》止,李蘇贈別詩計有十七首<sup>38</sup>,分為李陵贈蘇武詩(簡稱李陵詩)、蘇武贈李陵詩(簡稱蘇武詩)兩類:

<sup>35</sup>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97-103。

<sup>36</sup> 黃水雲:《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頁70。

<sup>37</sup> 胡大雷:〈蘇李詩出自代言體說〉,頁 16-17。

<sup>38</sup> 最早冠以李陵、蘇武之名的詩作(簡稱李蘇詩)始於《文選》,包含李陵〈與蘇武〉三首、蘇武〈詩四首〉。其後,《藝文類聚》的李、蘇詩各有八首、四首。又《初學記》則分別有三首、二首,至於《古文苑》則分別有八首、二首。刪除重複者,題名李陵者有十一首,題名蘇武者有六首,故李蘇贈別詩共計十七首。均為代言作品,作者不詳。按: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15「《古文苑》九卷」條云:「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北宋)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438。

其一,在十一首李陵詩中,除了〈鳳凰鳴高崗(闕〉〉³9;〈紅塵蔽天地(闕〉〉之外,其餘九首都在十句或十句以上,每首詩都是偶數句押韻、通押平聲韻,藉「離、思、歸、躕、徨、傷、忘、秋、悠、愁」等字收音,清楚揭示別離的主旨。⁴0再從這些詩歌內容來看,大致可歸納為「時間一空間一別情」三階段的抒情程序,初時,藉「晨風、良時、寒涼應節至」等概言別離時機;續而藉「明月照高樓、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徘徊溪路側、萬里遙相思」等建構送別時、送別後的空間場景;詩歌後半段則多以敘寫離情為主,使個人的心緒藉空間景物、時間流轉的交互依托,汨汨流淌出李陵的情意。詩人藉李陵之名以聚焦書寫李陵別情,充滿沉鬱頓挫的悲苦情緒,同時反映六朝詩人對李陵所寄予的無限同情。

其二,為蘇武代言的六首詩,多在十六句以上,較李陵詩的篇幅稍長,每首詩也都是偶數句押韻、通以平聲韻「親、依、歸、悲、飛、思」等字收音。其內容的書寫手法大致是:先以兩人交好的情誼作發端;續以空間的乖隔為喻;最後以綿長相思作結。詩中藉「骨肉、兄弟、嘉賓、良友」,乃至「連枝樹、雙飛龍、鴛鴦、夫妻」之情來書寫兩人綿密友好的情感,而今離別在即,日後兩人便有如「參商、秦胡、征夫、黃鵠、遊子」般地乖隔兩地,相離甚遠,雖說「相見未有期」,但仍希望能化為黃鵠來與君送別,與君長相思,並「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41「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頁 514)詩人以蘇武的視角敘寫離情,更因蘇武歸漢,致使詩情不僅止於蘊含一連串的離思,還為兩人的未來注入更多期許,而有別於李陵詩。

有作者指出,這些代言者多「出於一分不能自己、欲對『人同有之情』相參互 證的情懷。……(借鑒前人的生命經驗)重溫過去、參與現時、迎向未來……以生 命印證生命……(形成)認同。」42就李蘇而言,李蘇二人的遭遇,都苟活於異域中,

<sup>39</sup> 有關〈鳳凰鳴高崗〉一詩,《藝文類聚》記有四句「鳳凰鳴高崗,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 見稀。」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1559。

<sup>40「</sup>詩人們大抵喜在標明主旨時用平聲韻。」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頁 168

<sup>41</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513。

<sup>42</sup>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 4-5。

然蘇武最終得以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sup>43</sup>,而李陵抱憾「雖欲報恩將安歸」(頁 1877),兩人的遭遇有如雲泥之別,故後人代言的李陵詩多半具有抑鬱悲沉的情調,而蘇武詩則傾向於苦盡甘來或期盼未來的情懷。

若以李陵曾經經歷的生命抉擇來看六朝詩人的代言之作,不排除有藉他人之事、 述己之情的現實狀況,而此可由阮籍藉史抒懷的詩作<sup>44</sup>,或庾信、王褒等人滯胡不得 歸的遭遇與關鄉之思的抒懷作品得到印證。<sup>45</sup>再者,這些代言之作,若非冠名李陵或 蘇武詩,實未必僅限於李蘇二人的贈別情意,甚或不能排除這些作品已漸漸脫離李 蘇別情的範疇,漸趨於普及化,而廣泛適用於描摹一般骨肉、兄弟、夫妻、朋友之 間的離情,如此也並無不妥。

## (二)李蘇贈答書呈現之生命抉擇

李蘇贈答書最早見載於梁·昭明太子《文選》中,題為〈答蘇武書〉。46目前所見的文本,依《藝文類聚》所收計有三篇,分別題名為:漢李陵〈與蘇武書〉、漢蘇武〈報李陵書〉、〈李陵重報書〉。其中第三篇〈李陵重報書〉,內容不出《文選》中的〈答蘇武書〉,且各段都較為節略,故今以《藝文類聚》前兩篇(《文選》所無)47,以及《文選·答蘇武書》為討論文本。從文章出現的時代來看,真正由李蘇本人書寫的機率極低,或可解讀為六朝文人重新詮釋對李蘇的看法。以下分別探討篇章中李陵與蘇武之生命情志、人生抉擇,以及六朝文人意欲傳達的意念。

從內容來看三書信往返的順序,依序為〈與蘇武書〉、〈報李陵書〉、〈答蘇武書〉。

<sup>43</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 卷 54, 頁 1877。

<sup>44</sup> 如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頁 496-510。

<sup>45</sup> 如庾信〈擬詠懷詩二十七首〉:「悲歌度燕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荊卿不復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王褒〈渡河北詩〉:「……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關山月〉:「關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影虧同漢陣,輪滿逐胡兵。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等諸多詩歌。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367-2370、2340、2332。

<sup>46</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卷 41,頁 573-576。

<sup>47</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531-533。

三文架構均有:盛讚對方之言、自身經歷與慨歎、訣別之辭等三部分,以下擢取李 陵相關之生命抉擇分述之。

其一,李陵〈與蘇武書〉中,李陵盛讚蘇武「行志志立,求仁得仁」<sup>48</sup>在前;其後又慨歎自己——將兵五千、深入匈奴、轉戰千里,乃本著忠君、福主的愛國心,一心以建立功業、為主解憂、報效國家的目的而艱苦奮鬥,但最後卻如同「範(范) 蠡、屈原、孔子」(頁 532)有抱憾之志,甚且「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世事謬矣!」(頁 532)發出痛心受族的不平之鳴。就李陵而言,若能如蘇武「求仁得仁」,則自身苟活欲報的生命情志豈不得以實現,足見李陵對蘇武的艷羨之情溢於言表。再則,就朝代更迭頻繁、世事紛擾多變的六朝人而言,「求仁得仁」豈是易事?能不艷羨嗎?

其二,在蘇武〈報李陵書〉中,蘇武首先「自述經歷」——自謙奉命出使異域,卻有辱王命,本可以死謝罪,但因內心以忠義為本,故不屈於榮寵,強忍困頓,最終蒙受聖恩得以續命歸漢。並深慨:「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不亦休哉!」(頁 532)此處,六朝文人呈現了李蘇二人對生命抉擇、人生遭遇的對比,此種對比應源自《漢書》並陳李蘇傳記,並記「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實有互見、比較之嫌。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六朝文人首次藉蘇武之口,以「服節就死即是忠君」的角度來評價李陵,將蘇武守節、李陵未服節就死置於天平的兩端,為李陵投敵而抱憾,雖語氣平緩,仍認定守節才是美事。至於文末,蘇武以「餘(余)歸漢朝,子留彼國……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頁 532) 道出李蘇二人,一留北地;一歸故土,再次突顯兩人不同的死生抉擇與人生歸向。

其三,李陵〈答蘇武書〉。49此際的蘇武已歸漢受祿,雖然昔日情志相投,但如 今兩人已分屬二朝,故代言人揣摩李陵的心境,以「終日無睹,但見異類……誰與 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身負國恩,為世所悲。」(頁 573)

<sup>48</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532。

<sup>49</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卷 41,頁 573-576。

文中細數李陵身處胡地、懷鄉念土、憾恨受族的諸多無奈,敘寫李陵落寞與悲悽的 心境,入木三分,若代言者未曾身陷番中,又豈能如此具體體現個中三昧?

李蘇二人,均是大漢人才、均有忠君報國的使命與胸襟,曾在異域相知相惜、互訴苦衷,如今李陵有家歸不得,而蘇武則已回漢,際遇迥異,故話鋒一轉,李陵再度申明自己「不蒙明察,(漢皇)孤負陵心」(頁 573),故云:「然陵不死,有所為也,……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頁 574)為其屈辱苟活是欲有以報來鳴心見志(生死抉擇)。還反詰蘇武所云「漢與功臣不薄」(頁 575)等語,甚至嚴加抨擊「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陵雖孤恩,漢亦負德。」(頁 575)文中歷舉種種不平之鳴,呈現李陵遭受誅族後憤恨、煎熬的心境。儘管他身居胡地,「獨坐愁苦……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頁 573)但此時李陵的歸漢之心已由暫降匈奴、伺機報國,而徹底絕望,決意長留異域,故於文末以「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頁 576),與蘇武生死長辭(去留抉擇)。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六朝文人藉李陵之口,駁斥回歸故土的種種利多,這是否是陷番之人藉以開脫、自我寬慰的說詞呢?再則,文中數落漢皇「負德」、「孤負陵心」似乎開啟《李陵變文》「漢家天子奉陵德」的基調。

總之,檢視六朝文本,開始明顯有李蘇並舉或對比的情形,此應源於《漢書》之李蘇並陳、互見。其中,李蘇贈別詩可視為六朝詩人同情李蘇的離情而作,內容平鋪直敘,並未有死生別離之情,且描寫的別情亦有通用性,未必僅限於李蘇之間,「詩人往往超越時空,為古人代言,或托古事抒己懷抱。」50因此,若從李蘇贈別詩冠以二人之名來看,可知李蘇的別情愁緒、人生遭遇等課題,頗受六朝文人關注,並普遍成為當代離情的共同意象。至於李蘇往來的贈答書信,則將二人的別情與遭遇描寫得更為濃烈而深入,而且文章對李蘇二人更具有專用性,甚至藉李陵云:「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51,與蘇武遺憾李陵未能「服節死難」之言52,具體傳承了史傳中李蘇二人在價值觀、抉擇、及人生歸向的差異。整體看來,六朝文士多

<sup>50</sup>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頁 281。

<sup>51</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卷41,頁574。

<sup>52</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532。

以代言體來書寫李陵,且以同理的角度敘寫離情,這或與六朝時局不安、百姓離散有關。動盪的社會促使文人自覺地尋求個人價值,往往出現借鑒他人生命經驗的代言作品,以及滯胡不歸的抒懷作品等等,或許有藉他人之事、述己之情的狀況,是以六朝文本呈現的李陵現象雖不明顯,但已可視為李陵現象的醞釀期。

## 四、唐代李陵相關之共時文本

本單元以唐代涉及李陵的詩、文、敦煌寫卷等文本,探討同一時代、不同文體 所呈現的李陵現象。就唐代社會而言,政治上以科舉取士,打破門閥,激勵社會各 階層人士普遍重視詩文的創作,再加上政經榮盛、國力強大,故不斷向外擴展版圖, 促使中外交流頻繁,也使那些多半來自社會中下階層的士人們,擷取不同的生活面 向、胡漢交流等諸多題材來抒情、敘事,並延續漢魏六朝的民歌思潮,因而有詩、 文、敦煌寫卷等大量作品的出現。53

其中,有關李陵的唐代詩文,舉凡是仿古而作的樂府或詠史詩<sup>54</sup>;或因戰爭頻仍 而流行的邊塞詩文,包含征戰中落蕃者的心情詩歌<sup>55</sup>;又或藉李蘇來表述作者個人見 解的作品等等<sup>56</sup>,唐人們多以平民的眼光,反映舉事頻繁的社會現狀,或藉以抒寫個 人懷抱,這些內容對李陵多是寄予同情的;但若以致仕為目的者,則立於國家視角, 對李陵降敵多所批評。至於李陵相關的敦煌寫卷,有《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

<sup>53</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95),頁365-538。

<sup>54</sup> 如貫休〈戰城南〉、盧綸〈從軍行〉、劉灣〈李陵別蘇武〉等等。清・聖祖御纂:《全唐詩》(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巻 17,頁 56、巻 278,頁 69、巻 196,頁 458。

<sup>55</sup> 如《全唐詩》之李端〈塞上〉、楊衡〈邊思〉等等,卷 286,頁 727、卷 465,頁 1180。又如岑參〈七言〉:「邊城漢少犬戎多,……」、孔璋〈國中登山〉:「戎庭悶且閑,……」、等敦煌地區傳抄詩歌;沙洲文人〈張懷深變文文末附詩〉:「河西淪落百年餘,……」、□定千〈闕題〉:「焜(燉)煌西裔是臨邊,……」等敦煌詩人作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696、713、801、839。

<sup>56</sup> 如樊衡〈河西破蕃賊露布〉、郭仲翔〈與吳保安書〉等等。清·董誥:《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352,頁1580、卷358,頁1608。

詞》,以及《李陵蘇武往還書》三種,其中,前二者屬變文,是以寓教於樂的社會功能為主,故立於民眾的視角,講唱同情李陵的內容,而《李陵蘇武往還書》是唐人為李蘇代言的書信,它是以大漢民族的國家視角,羅列李陵未能死節的諸多罪狀,且詞鋒犀利,厲聲責難。

由於這些唐代文本比六朝更加繁複、多元,不同文類的書寫內容也反映作者(或講唱者)對李陵生命抉擇的褒、貶,事實上,有不少篇章是藉李陵事以抒懷,主要呈現作者個人的生命抉擇。以下分別以唐代詩文、敦煌寫卷為材料,藉由多重文類的視角,探究唐人對李陵生命抉擇、李陵現象的立論觀點及其意義。

## (一) 唐代詩文之相關文本

自漢至唐,隨著不同時空的轉換、文史資料不斷的積累,唐人對李陵的書寫觸 角較六朝文人更為廣泛自由,這些李陵相關的詩、文大致可分為:認同李陵者與批 評李陵者兩種爭論,其中,認同李陵的「李陵們」,因程度不同,可再細分為寄予同 情者、積極認同者兩類。在此架構之下,分別探討唐代詩歌、文章對李陵生命抉擇 的觀點與評析,以及李陵之於唐代詩文的影響。經仔細搜羅、剖析文意之後發現, 唐詩多屬認同李陵者;唐文則認同、批評兼而有之,分述如下:

#### 1.認同李陵者之生命抉擇

#### (1) 寄予同情者:

凡運用李陵其人其事作為感懷之典故,且未有批評或攻訐者,或直書同情其遭 遇者均屬之,他們可總稱為「李陵們」,這是唐人書寫李陵時,為數最多的部分。在 詩作方面,有單純用典者,也有涉及別離、思歸的主題者;唐文方面則多是藉李陵 以自況。

#### I、唐詩方面:

傳統借史抒懷的詠史詩,詩人往往藉由歷史人物或陳跡,抒發自己感時傷逝的 深沈慨嘆;懷才不遇的苦悶心境;或藉古諷今的歷史情懷。然而李陵相關的唐詩多 半偏重於感歎李陵的人生遭遇、生死抉擇、去留抉擇與別思,較少自抒胸懷者,例 如運用「李陵衣」的典故者,如李白〈蘇武〉:「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泣 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sup>57</sup>歌詠蘇武歸漢前夕與李陵執手相對的泣別之情;又如使 用「李陵台」的典故者,如唐末胡曾〈李陵台〉:「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 荒。英雄不伏蠻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卷 647,頁 1632) 描寫李陵羈留胡地、 企望南歸的心情。

此外,有些涉及了蘇李別離的主題,如顧況〈劉禪奴彈琵琶歌〉:「李陵寄書別蘇武,自有生人無此苦。」(卷 265,頁 661)寫李陵為己而悲的惆悵、悲悽。還有更多的是以思歸為主題,慨嘆李陵有鄉不得歸的哀悽之情,這應是延續六朝李蘇贈別詩、贈答書的脈絡而來,如李白〈千里思〉:「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一去隔絕域,思歸但長嗟。」(卷 25,頁 95)李白〈奔亡道中〉:「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李陵降未歸。……幾時可生還?……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卷 181,頁 421)胡曾〈交河塞下曲〉:「交河冰薄日遲遲,漢將思家感別離。……隴西雲起李陵悲……春入關山雁獨知。」(卷 647,頁 1630-1631)裴羽仙〈哭夫〉「李陵一戰無歸日,望斷胡天哭塞雲。」(卷 801,頁 1965)將李陵望斷天涯、企盼歸鄉的酸楚書寫得淋瀉盡致。

由此可見,唐人書寫李蘇滯留胡地的塞外情景、生機渺茫的戰場實況、黯然銷魂的離情別緒與思鄉情懷等主題之餘,也對身處胡漢邊地、曾面臨類李陵抉擇的將士們,有高度的關注與同情,此可與唐代邊塞詩的盛行相互呼應。58甚且,唐人歌詠李蘇的詩作,其詠嘆的對象非常明確,和六朝代言的李蘇詩可普遍運用於諸多對象的情況顯著不同。

#### II、唐文方面:

凡唐文屬於寄予同情的部分,幾乎是「作者藉李陵以自況」。如〈河西破蕃賊露

<sup>57</sup>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卷 181,頁 422。

<sup>58</sup> 唐代自初唐開始,連年對外爭戰,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內憂外患,更促使邊塞詩的流行。除此之外, 唐朝因內亂而無暇西顧的沒蕃漢人,也因「身在蕃,心在漢」,而有相關詩作的流傳,如敦煌寫卷 P.2555 有馬雲奇的詩作。薛宗正:《邊塞詩風西域魂:古代西部詩攬勝》(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 版社,2003),頁 60-70。

布〉一文,乃河西節度使樊衡歷述自己於河西破蕃賊的經過。文中提及「李陵之兵盡矢窮,緤為之虜,……未有如今之深入能勝歸者。此乃陛下神斷之謀也,聖威之被也。」59實僅藉李陵矢盡兵窮而受虜未歸,襯托樊衡軍隊不但深入絕域、橫跳千里,還能得勝凱旋,所完成的艱巨任務更勝於李陵轉戰匈奴。全文藉李陵以自況戰功輝煌。

又如〈投殿院韋侍御啟〉一文,乃唐末顧雲(?-894)投書韋侍御,乞能增益兵力,以潰敵致勝。文中提及「李陵矢盡,項籍兵窮,歸漢懷慚,還吳失計,所以重嘘懦氣,再奮空拳,而我師甚寡,彼敵尚強,……欲有乞師之志。」(卷 815,頁 3803)即借鑑李陵矢盡而奮空拳、嘘嘆不已,用以自況目前的處境,期請韋侍御能「益奇兵,濟餘勇」(卷 815,頁 3803),以洗雪兵敗之恥,避免重蹈李陵覆轍,抱憾而終。

較特別的是皇甫湜(777-835)〈鶴處雞群賦〉云:「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眾人皆醉。或振羽以將鳴,或峨冠而瞪視。……。安知警露之質,豈識凌雲之意?」(卷 685,頁 3107)則是藉李陵居胡地如同自己身居朝中,慨嘆知音難覓。另外,李商隱(813-858)〈獻舍人彭城公啟〉敘及「李陵空跡勇而無益;……方今聖政維新……廓開雅道……儻或不吝鑄人,必令附驥。」(卷 778,頁 3600)慨嘆李陵空有自身條件,卻生不逢時,用以自況自己不僅有如李陵般的良才,而且生逢聖政維新之際,故期望能毛遂自薦而承蒙受任。

以上都是唐文作者分別以第三者的角度詮釋李陵之事,藉由李陵兵盡矢窮(生死抉擇)、身居胡地(胡漢歸屬、去留抉擇)或身不逢時等事件以自況,或形成對比, 然其主要用意在表述撰者的自我見地,也傳達對李陵同情之意。

#### (2)積極認同者

凡唐人書寫李陵的詩文中,除了同情李陵的遭遇之外,還肯定其歷史地位或以李陵抉擇為典範者,均屬之。

#### I、唐詩方面:

積極認同李陵者,有如司空圖〈狂題十八首〉:「不是史遷書與說,誰知孤負李

<sup>59</sup> 清·董誥:《全唐文》, 卷 352, 頁 1579-1580。

陵心。」<sup>60</sup>肯定史遷為李陵平反,說明漢武帝辜負李陵報漢之心。貫休〈戰城南〉: 「磧中有陰兵,戰馬時驚蹶。輕猛李陵心,摧殘蘇武節。」(卷 826,頁 2024)藉由 李陵作戰時敏捷勇猛的形象,與蘇武的守節不移作對比。貫休〈灞陵戰叟〉:「尋班 超傳空垂淚,讀李陵書更斷腸。」(卷 836,頁 2045-2046)說明詩人讀李陵傳,為其 處境感到悲傷不已。

然而最能道盡李陵情志者,以王維〈李陵詠〉<sup>61</sup>、劉灣〈李陵別蘇武〉<sup>62</sup>最具代表性: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 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少小蒙漢 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李 陵詠·王維〉)

漢武愛邊功,李陵提步卒。轉戰單于庭,身隨漢軍沒。李陵不愛死,心存歸 漢闕。誓欲還國恩,不為匈奴屈。身辱家已無……身為漢宮臣,死為胡地骨。 萬里長相思,終身望南月。(〈李陵別蘇武・劉灣〉)

就作者而言,王維「時年十九」<sup>63</sup>作〈李陵詠〉,正值開元初唐玄宗積極施政、廣進人才、大事邊功的時機,挾帶著威盛的大唐國力,激勵了士人積極建立功業的信心,而青年才俊、蓄勢待發、尋求仕進的王維自不例外,內心也充滿奮發昂揚的愛國情操,對李陵馳騁沙場、奮勇忠君卻不得善終,投以無限的同情與慨嘆,而作〈李陵詠〉。<sup>64</sup>劉灣是盛唐邊塞詩人之一,其詩歌多側重對征人乖舛命運的同情,一方面諷刺上位者著重邊功、邀功固寵,另一方面也書寫賞罰不公的社會現實,多為關懷人性與反對窮兵黷武而發聲。<sup>65</sup>

<sup>60</sup>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 卷 634, 頁 1599。

<sup>61</sup>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卷 125,頁 288。

<sup>62</sup>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 卷 196, 頁 458。

<sup>63</sup>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摩詰全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63。

<sup>64 「</sup>王維十五歲(開元二年)離家、遊長安,……十六歲繼遊長安、洛陽,……去洛陽的目的是投謁 進取,與玄宗東幸洛陽有關。……十九歲赴京兆試,舉解頭。……二十一歲遊長安,繼與諸王交游。 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張清華:《王維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頁 18-32。

<sup>65</sup> 如「將軍在重圍,……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牧秋月,

二詩都肯定李陵之才,極力稱許李陵擅兵疆場,並能得軍士死力,而「深入單于壘」、「轉戰單于庭」,但最終因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身降胡虜。其中,王維藉由李陵事件,抒發愛國青年對積極立功的期待與擔憂;而劉灣則從漢武著重邊功起筆,寫疆場戰士義無反顧的誓死殺敵、建立軍功,然而面對生死一線間的抉擇,雖以報皇恩為念,終究難逃身敗名隳、家族受誅的命運。再者,二詩藉「深衷欲有報」、「誓欲還國恩」,展現將士對國家的忠誠,而身降未死,實因李陵自詡「身為漢宮臣」,且「漢恩」、「國恩」何期浩蕩!故屈辱苟活是為了達成更高遠的理想、完成歷史任務,即便客死胡地也在所不惜,又豈是貪生求榮之輩可以比擬的?呼應了司馬遷言李陵有「欲得其當而報於漢」的決心。66表面上,王維與劉灣對李陵都深表同情與認同,實際上或有藉漢言唐之意,表述戰爭的殘酷、社會的不公,故發出深切的嘆惋。II、唐文方面:

唐文撰者對李陵投敵的看法,多是以旁觀者的視角評之。但若曾經置身於如同李陵般的兩難處境,則對李陵的思慮與抉擇會有更深刻的體認與覺察。如郭仲翔〈與吳保安書〉云:「深入賊庭,果逢撓敗,……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宮中射雁,寧斯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地。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侄,不同眾人……。」67郭仲翔戰敗身降蠻夷長達十五年,以「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自敘身陷胡漢戰爭的困境中,並親身經歷如同李陵滯胡未能歸的處境,故能深刻體會李陵陷虜的艱難。所幸郭仲翔乃唐宰相郭元振(656-713)的姪子68,後由吳保安贖回,才得以歸唐。

再如蕭華(?-760)〈謝試秘書少監陳情表〉云:「每讀李陵之書,備見前賢之意,以為虛死不如立節,成名不如報德。……偷生苟安,蓋所以誓將骸骨歸死朝廷,

疲卒臥霜風。」(〈出塞曲〉)、「去者無全生,十人九人死。……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蒼天滿愁雲,白骨積空壘。」(〈雲南曲〉)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卷 196,頁 458。

<sup>66</sup>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頁 578。

<sup>67</sup> 清·董誥:《全唐文》, 卷 358, 頁 1609。

<sup>68</sup> 郭元振約活躍於武周至中宗、睿宗復辟時期,依此約可勾勒出郭仲翔的存活年代。

伏賴陛下察以愚衷。」(卷 370,頁 1663-1664)對蕭華而言,雖身歷安史之亂,遭受 脅迫而仕於安祿山燕軍,但因自己一心向唐,因而以李陵「虚死不如立節」為典範, 長期屈辱苟活、「誓將骸骨歸死朝廷」,期以待機報德。

杜牧(803-852)擔任唐宣宗考功郎中,知制誥,撰〈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云:「敕。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寇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為虐典;魏舍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為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諮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命。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卷750,頁3443)敕文述及武易簡守崖州,寇來乘城,棄城而逃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官方敕文明確指出:「漢誅李陵,是為虐典……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即唐宣宗對李陵降敵一事,認為朝廷應該抱持憐憫的態度,故武易簡家族並未遭受誅族,朝廷只針對武氏量刑責罰,而移守梧州。

綜上所述,在認同李陵(寄予同情者、積極認同者)的部分,不論詩歌或文章,頗多運用李陵事典以抒懷述志,其中涉及離情、思歸的主題者,以寄予同情李陵的詩歌為多,此乃傳承六朝李蘇贈別詩之流,而且多有李蘇並舉的情形。至於唐文同情李陵的部分,則多藉李陵事蹟自況,然撰者著意於表述自我見解為主,然而,不論是唐詩或唐文,文人對李陵的人生遭遇或生死抉擇的書寫,較六朝人更為深刻且具體,所呈現的李陵現象(「李陵們」、「非李陵們」)的聲量也較六朝人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對李陵積極認同的「李陵們」,如郭仲翔(敗降南蠻十五年)、蕭華(身歷安史之亂)等,內心都存有心向朝廷、待機報國的理想,然身歷胡漢戰爭或朝廷紛亂之際,中央尚無暇拯救,故使他們在面臨生死抉擇的困境時,多以李陵的生命抉擇(屈辱苟活以待時機)為典範,這延續史遷得當報漢的觀點。甚且,代表官方立場的〈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針對李陵降敵一事明確道出:「漢誅李陵,是為虐典,……,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卷750,頁3443)由於〈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是社牧奉唐宣宗敕命所作,從《資治通鑑》的記載:「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sup>69</sup>可以推測,或許是因為宣宗有心扭轉唐末頹勢,亟需廣納人才,故對人才採取較寬鬆的態度,因而認為漢武帝對李陵事件的處理過於苛虐。不但直指漢武帝誅族李陵「是為虐典」,並且對於如同李陵之類有心無力的人,應以「法宜矜焉」的態度,表現同情、憐憫之意。儘管敕文的背後可能有朝廷的特殊動機或政治目的,但仍然不失為官方對李陵事件的一種表態。甚且,若當初漢武朝臣對待人才的態度如此堅定,或可阻止李陵、史遷連串悲劇的發生。

#### 2.批評李陵者之生命抉擇

凡唐人文章批評李陵降敵、變節等內容者,均屬之。如薛登<sup>70</sup>〈論選舉疏〉云:「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sup>71</sup>議論選賢任人必定要崇禮讓、明節義,才不致於有如李陵降敵,令鄉人蒙羞之事。又如王叡<sup>72</sup>〈誠節論〉述「既不能仗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恥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為負義。」<sup>73</sup>評論李陵降匈奴,原本寄望藉由變通,達成報國的目的,結果既無仗節死義,反致母妻被族,只能算是負義偷生無恥之人。顯見批評者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闡述個人的價值觀,並以士大夫的名行榮辱為標竿,視李陵未能死節為恥,論點具有特定的目的性。

前二文(分述選才任賢、誠節立名的重要性)列舉李陵之事只是文中眾多事例 之一,唯有白居易(772-846)〈論李陵〉是以專文評判李陵。其文云:

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

<sup>69</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 249,頁 8076。

<sup>70</sup> 薛登,本名謙光,以與太子同名,敕賜名登,常州義興人。文明中,解褐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尚書左丞,開元初留守東都,再為太子賓客。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清·董誥:《全唐文》,卷 281, 頁 1260。

<sup>71</sup> 清・董誥:《全唐文》, 巻 281, 頁 1260-1261。

<sup>72</sup> 王叡(約於唐末亂世之時)自號炙轂子,其《炙轂子詩格》有引用李郢詩,並稱李郢為端公,而李郢是唐宣宗大中10年(856)進士,故其《炙轂子詩格》應完成於大中咸通以後,甚或是乾符(874)以後之事。王夢鷗:〈炙轂子及其詩格考〉,《幼獅學誌》16:2(1980.12),頁71。

<sup>73</sup> 清・董誥:《全唐文》, 卷 725, 頁 3311。

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

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 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 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 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74

文中主要以「忠、勇、智、孝」四個面向檢視李陵降敵之舉,用以駁斥「《史記》、《漢書》皆無明譏」,可謂李陵史傳的翻案文章。

然而白氏〈李陵論〉所述忠、勇、智、孝四事,要點皆在於不能「死義」:「不死於王事」、「生降於戎虜」皆言陵之不死,「棄前功」、「召後禍」皆屬未來不可預料之事。由於白居易出生於大歷年間,早年顛沛流離,深刻體會百姓疾苦。唐德宗貞元 15 年(799)著〈李陵論〉時,約其鄉試及第後、進士試及第前,正值意氣風發之際,加上個性務實剛直,注意政治與社會黑暗面,其後的諷諭之作甚多,都以積極表現忠君為民的赤誠之心為務。75因此認為李陵若選擇死節,便可名垂不朽。其實類似的觀念早在六朝的蘇武〈報李陵書〉即已出現,而白氏〈李陵論〉即是以士大夫的視角——死節乃忠作為唯一的標竿來評價李陵,卻不免強人以死,也完全忽略李陵不得已的抉擇。

事實上,漢代史傳敘述李陵抉擇不死、屈辱苟活的目的在於企望擇日再成王事、 達君命、立戰功,以報國,豈不忠不勇者所圖之事?甚且,武帝時盛行藉軍功以進 爵,若「棄前功」而不死,則仍有機會再創功業、榮耀先祖,此豈有不智?李陵又 豈能逆料未報皇恩便遭人構陷,以致族滅?又何來不孝之名?以此,年輕氣盛、積 極忠君的白居易全然站在國家的立場,不追究上位者的過失、同儕的構陷,而認為

<sup>74</sup> 清・董誥:《全唐文》, 卷 677, 頁 3063。

<sup>75 「(</sup>白居易) 貞元十六年春, ……, (進士試) 及第……貞元十八年, 又登書判拔萃科, 授予校書郎官職。……元和年間, 創作諷諭詩, ……或諷諭時政, 或打擊權貴, ……並積極勸諫, 曾為憲宗所惡。……並時時於詩文中流露其不滿情緒。由於積極創作諷諭詩, 嘲諷時政, 抨擊社會黑暗, 反映民生疾苦, 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 ……此為白居易為民喉舌之諷諭詩及忠君為民的赤誠表現, 亦為日後白居易被疏遠、貶謫種下禍根。」王偉忠:《白居易散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3), 頁 34-43。

臣子應當為國死節,然此類非議李陵的「非李陵們」,畢竟未曾真正面臨類似李陵的 生死抉擇與困境,一旦遭遇生死關頭如何抉擇,不免無法驗證。

## (二)敦煌寫卷之相關文本

現存敦煌寫卷中,漢將李陵相關文本有四:《李陵變文》(擬題)(以下簡稱《李陵變》)、《蘇武李陵執別詞》(以下簡稱《執別詞》)、《李陵與蘇武書》與《窮囚蘇子卿謹獻書於右効王閣下》(後二文同卷抄寫,合稱《李陵蘇武往還書》(擬題),以下簡稱《往還書》)。此四者均流傳於民間,是以敦煌軍民的視角、娛樂的需求,甚或是歷史教育的作用,撫慰軍民對時局的各種感受,又或以宣洩他們的鬱結情緒為書寫目的,並透過講唱活動的傳播,以宣揚愛國意識,均屬通俗文學的範疇。76經檢視上述四寫卷內容,《李陵變文》與《執別詞》屬認同李陵者,而《往還書》二文則屬批評李陵者,各文中所書寫的李陵生死抉擇與個人情志之相關李陵現象,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意義,分述如下:

#### 1.認同李陵者之生命抉擇

#### (1)《李陵變文》生命抉擇

《李陵變》是講唱歷史故事的寫卷,首殘尾全,韻散交錯。散文以敘事為主, 其後往往帶有類似「看李陵共單于火中戰處」等畫面的指示性文字,唱詞則以敘事 兼帶咏嘆,可見是作為連說帶唱、兼具變相的講唱活動的底本。內容大抵以《漢書· 李陵傳》為藍本,主要講述漢將李陵率領五千步卒對抗匈奴十萬大軍。變文第一個 畫面前的指示文字缺損(可擬為〔陵軍乘勝追擊處〕),依次還有六個畫面的場景, 分別是:看李陵共單于火中戰處;李陵共單于鬭戰弟(第)三陣處;且看李陵共兵 士別處;單于高聲呵責李陵降服處;誅陵老母妻子處;李陵出迎漢使處。其中,由 「李陵共單于鬭戰弟(第)三陣處」,可推知全文應有七大段落:前五段的內容敘述 戰事消長及決定降敵的過程,包含第一段的以寡擊眾、乘勝追擊,第二段的戰火慘

<sup>76</sup> 朱鳳玉:〈敦煌邊塞主題講唱文學的傳播與軍旅情懷〉,《敦煌學》27(2008.2),頁 43-61。後收入《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62-87。

烈,第三段因管敢洩漏軍情而敗陣,第四段投降前的內心掙扎,第五段假意投降匈奴;第六段敘述陵母妻子受族,消息未明;第七段蕃中得陵家被族書。變文中,凡與《史記·李陵傳》、《漢書·李陵傳》重複的部分不再贅述,然而值得注意之處大致有三點:

其一,第四段李陵降敵前的內心掙扎:李陵在兵盡降敵之前,反覆思量的是, 究竟要投降(降)或死節(死)呢?一則,李陵眼見即將全軍覆沒,屬下勸降。(降) /一愁莫展之際,後乃云:「吾今不死者,非壯士也!」"(死)二則,思及漢高祖 帶領三十萬大軍仍困於平城,需陳平奇計才得以脫困;然陵軍僅以五千兵力,對抗 十萬敵軍,即使降敵亦非陵過(此一內容源自六朝〈答蘇武書〉)。(降)三則,思及 天子授命三軍節度,豈可辜負皇恩?(死)/「奈何漢弱胡強,……道理須降。」 (頁130)(降)四則,明旦,已決定降敵:「吾今薄命,天道若此!儻若至朝庭,明 申道理。」(頁130)若天意要我降敵,日後再向天子說明心意,李陵將一切解釋為 天命,此則與班固《漢書・李陵傳》之說不謀而合。(降)

換言之,李陵在反覆思慮之後,乃抉擇「須運不策之謀,非常之計,先降後出, 斬虜朝天」(頁 131),而且,他相信漢武帝應可理解他報漢之心。此處一方面延續史 遷、班固的觀點,一方面擴增事例,加強描繪李陵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扎,抉擇的 困境不言可喻。

其二,第六段陵家被誅後的消息不明:降後隔年,武帝曾派公孫敖救李陵,但因公孫敖兵馬失利,誤傳「(李陵)教單于兵馬法」(頁 132),故使武帝誅族陵家,並怒閹史遷。值得注意的是,《漢書·李陵傳》記「(公孫敖)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sup>78</sup>但《李陵變》則記「其時有往年敗將李緒教單于兵馬法,打公孫敖兵馬失利。……(公孫敖)問:『蕃中行兵將是阿誰?』是李緒不能自道:『……是我李陵。』……(公孫敖)曰:『臣兵馬不合失利,盡是李陵教單于兵馬打臣兵馬,失利輸兵。』」(頁 132)公孫敖為自己兵敗而脫罪,但誤

<sup>77</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130。

<sup>78</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 卷 54, 頁 1871。

傳「(李陵)教單于兵馬法」一事,在《漢書·李陵傳》是因生口無心之言,至《李陵變》則是因李叙(緒)故意栽贓,而且《漢書·李陵傳》並未明載蕃中消息不明的細節。

其三,第七段李陵慽恨漢家天子辜德:武帝誅族陵家隔年,又派漢使王進朝入蕃查探李陵行踪,李陵在確知陵家受族之後,慨嘆:「制不由己降胡虜,曉夜方圓擬歸國。今日皇天應得知,漢家天子辜陵德。」(頁 133)變文便在「漢家天子辜陵德」的唱詞中戛然而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書·李陵傳》記載武帝遣使(未指名)至匈奴,李陵問:「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因而澄清是李緒教匈奴練兵,而非李陵。變文則藉由使者王進朝之口,說明「總是公孫邀(敖)下佞言,然始殺却將軍母。」(頁 133)致使李陵垂淚悲號,慨嘆漢武帝不應辜負李陵報漢初心。

上述三點正好是影響李陵生死抉擇的重要關鍵,第一點敘述李陵原有死戰犧牲的意圖,而非貪生怕死、貪圖爵寵之徒,而在生死掙扎之後,最終決定假意降虜。變文講唱者敘述李陵以「先降後出」(陵降)為手段,達到「斬虜朝天」(報國)的目的,為李陵降敵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一方面博取聽眾的同情,另一面也藉此道出敦煌軍士們面臨生死的抉擇關鍵。第二點、第三點是公孫敖事件導致陵家被族,迫使李陵報國無門,歸鄉路斷,無奈抉擇滯留胡地,塑造出李陵無法建功立業,實現自我理想的悲劇英雄的形象,也為那些長年身處胡漢交界、經年面對生死瞬間、思歸情懷的「李陵們」找到認同的出口,並助長此類李陵現象的滋長擴大。

且在考察《李陵變》時,應著眼於自漢至唐胡漢相爭的視角,至於作品反映的時空背景,則未必僅限於一時一地。如同陳黯(805-887)〈代河湟父老奏〉一文所言:「中國之患邊戎,其來久矣!……唐有天下……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伺隙,侵掠邊州。」<sup>80</sup>又或是唐代諸多將領,如高仙芝等,因征戰不利而為落番之人,無論是李陵相關的歷時文本或共時文本,經常反映出胡漢交雜的邊地下,以及

<sup>79</sup> 漢・班固:《漢書・李廣蘇建傳》, 巻 54, 頁 1871。

<sup>80</sup> 清·董誥:《全唐文》,卷 767,頁 3538。

在降敵、死戰的抉擇中,無數文人武士對李陵普遍的關注與深切的共鳴,是故位居河西重鎮的敦煌,能夠催生像《李陵變文》之類的講史變文,相當合情合理。甚且,此種李陵現象(「李陵們」)從初唐以後的內憂外患,到中唐之後的安史之亂、藩鎮割據,或是瓜沙的陷藩時期,都頗為常見。

#### (2)《蘇武李陵執別詞》

《蘇武李陵執別詞》的篇幅短小,句式近於四六,屬變文用語。81若從全文的設詞用語、內容鋪陳的順序來看,應可溯源與《文選·答蘇武書》有關,但歷來幾無專文研究它。依《執別詞》的內容來看,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含李陵為蘇武送別的塞外場景、蘇武把酒回謝韓曾82迎歸,以及蘇武語諷李陵陷虜不歸等,約佔全篇的三分之一。第二部分是李陵回憶昔日作戰、「不免詐降單于」83、因「武帝取佞臣之言」(頁1202),誅戮老母少妻之後,已「無迴心」、自嘆「何負天」,故請託蘇武「(到)老母墳前,慇懃為時日拜著;到武帝殿前,為陵怶(披)訴。」(頁1202)李陵一方面怨懟武帝斷了他的歸鄉路,另一方面也表述他與蘇武的交好,以及他身在胡地心在漢的心境。否則何以請託好友去陵母墳前祭拜、皇帝殿前訴冤呢?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祭拜的情節並未出現於其他相關文本中,此一特點似乎是為了突顯李陵忠孝雙全的形象,也再度澄清李陵之所以選擇降敵,未必是負漢,而是有報漢的苦心,亦可呼應史遷、班固的觀點,並由變文廣泛傳播的狀況來看,見知「李陵們」的現象已在敦煌軍民的心底發酵、擴展。

附帶一提,《蘇武李陵執別詞》一文的開頭是「於是泣啼相送,漸過峻溪」(頁 1202),前無所承,實不應以「於是」為句子或文章的起始,故雖有首題,但此一寫 卷的完整性仍有待查證。84再者,寫卷主題是李陵為蘇武送行,但有關蘇武的內容極

<sup>81</sup>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1202-1203。

<sup>82</sup> 韓增(?-前56)少年時為郎,曾任光祿大夫,至昭帝逝世(前74)時,韓增已官至前將軍(蘇武 歸漢在昭帝始元6年,西元前80年),後又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元平元年,前74)水衡都尉 光祿大夫韓增為前將軍」、「(神爵元年,前61)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漢・班固:《漢書・ 百官公卿表》,頁681-682、688;《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頁2214-2215。

<sup>83</sup> 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1202。

<sup>84</sup> 羅宗濤也有類似的說法:「一開頭就是,『於是泣涕相送:』顯然前面還有文章。」氏撰:〈敦煌講經

少,大半篇幅記載李陵昔日轉鬥千里、漢武誅族、歸鄉望斷的往事,似有喧賓奪主之勢,此亦可推知現存抄本開頭之前應有所省略。

總之,《李陵變》、《執別詞》兩篇變文,都以較多的篇幅來歌頌李陵,二者均屬 認同李陵的講唱文學作品,藉由這些作品的流傳,更足以證明此一藉漢言唐的李陵 現象實際上反映了胡漢交雜的邊地軍士們經常面臨與關注的切身議題。

#### 2.批評李陵者之生命抉擇

有關批評李陵觀點的唐代敦煌寫卷是《李陵與蘇武書》與《窮囚蘇子卿謹獻書 於右効王閣下》<sup>85</sup>(二文合卷,簡稱《往還書》),今存五卷,它是模擬李陵、蘇武二 人的書信往返。<sup>86</sup>其所書寫的李陵生死抉擇與個人情志,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意義 與現象,分述如下:

#### (1)《李陵與蘇武書》

《李陵與蘇武書》內容包含:李陵自述家世、先帝任命出征、(天漢2年)爭戰慘烈過程、自訴變通降敵、極力勸降蘇武等。就文意考量李陵的生命抉擇的轉變:李陵出身於「死節效主,輕生盡忠」<sup>87</sup>的武將世家,自詡能文能武。戰爭之初,陵軍雖是處於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情勢,仍可乘勝追殺胡兵,橫屍遍野,自料「生不辱主,死不辱父,臣子之心,只可然也。」(頁296)足見李陵報漢的決心。其後,陵軍陷入苦鬥,兵乏矢窮,又無後援,仍云:「唯照此心,天日不謬。」(頁296)此時的李陵與司馬遷筆下的李陵如出一轍。但因「天奪人願,成陵者在天,敗陵者在天,天喪余矣!」(頁294)李陵慨嘆戰敗乃是天意,說服自己投降才是知所變通,「滅父母之髮膚,留名萬代……並是頑人矣!」(頁297)此處與班固將李陵的爭戰

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中華學苑》27(1983.6),頁78。

<sup>85</sup> 蘇武,字子卿。單于立李陵為右效王。

<sup>86</sup> 由《往還書》各寫卷題記可知,其抄寫年代大約是西元 915-928 年間。王重民先生認為:抄本寫於五代,則作者當為晚唐人。邵文寶則認為它創作於 915 年之前不久,乃曹議金為謀取瓜沙地區統率權所作的輿論工具。分見於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09;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收入季羨林等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80。

<sup>87</sup> 李丹和:〈校訂敦煌本《李陵蘇武往還書》〉,收入《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頁 293。

失利、無可奈何歸諸於天,屈辱苟活是欲以報漢(變通)的結果,若合符節。至於死節只是徒留虛名的部分,又承自六朝李蘇贈答書而來。最後以「如今受萬戶之俸,為一部之王,呼吸風生,吹噓翼颺,……能跪單于,百年受貴」(頁 297),以及「小人則固執,君子則變通」(頁 297)為由,勸降蘇武。此際的李陵已是貪生求榮的叛國者,文中反諷李陵未能死節的意味濃厚,全無忠君的初衷,更無節操可言。

#### (2)《窮囚蘇子卿謹獻書於右効王》

這是蘇武反駁李陵勸降的文章,內容約可整理為李陵具「不忠、不孝、不信、不義、不堪為將、不能勵兵、不能守節」等七條罪狀。<sup>88</sup>其一,蘇武認為李陵「棄本逐末,背親向踈,無懷漢主之恩,……不省己過,毀我國家。」(頁 300)是為不忠。其二,「老母被誅,少妻受戮,猶戀蕃中無用之賞,……帝聞致責,然始滅足下氏族,……因子害母。」(頁 301)是為不孝。其三,「食君之祿,須達君命。虛稱漢將,枉費國家,徒傾萬石之糧,枉陷五千之卒。」(頁 300)是為不信。其四,「婚單于女,受單于官……自遷擬入雲霄,陷他人於溝壑。」(頁 301)是為不義。其五,「不自測度,……致使戰敗沙場,……蒼生何辜,枉被烹宰!」(頁 300)是不堪為將。其六,「訓令無方,告示失所,……糧賜不均,處御不則,致使管敢背叛。」(頁 301)是不能勵兵。其七,最令蘇武切齒的是「憶昔初入蕃中……令僕莫跪單于……奈何今日卻致說辭,令僕跪毛血之人。」(頁 302)是不能守節。從蘇軾洋洋灑灑的羅列李陵七大罪狀來看,皆肇因於戰敗投降、不能守節所致。

若從國家綱紀與儒家觀點而言,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若蘇武——以士大夫的氣節為重,因而認為「見利而動,小人也;守道而安,君子也。」(頁 299)故以戰敗,唯當一死,此乃兩者之間最大的矛盾所在。此與六朝文蘇武〈報李陵書〉、唐代詩文批評李陵者乃一脈相承,唯〈報李陵書〉僅論及:「向使君服節死難……永在不朽,不亦休哉?」<sup>89</sup>嘆息李陵未能死節,但言詞尚稱委婉,未若唐人批評李陵之嚴厲。

總之,《往還書》二文可由四個面向來看:其一,從史實內容來看,在《李陵與

<sup>88</sup> 七條罪狀之順序,已經過調整。李丹和:〈校訂敦煌本《李陵蘇武往還書》〉,收入《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頁 299-303。

<sup>89</sup>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頁 532。

蘇武書》中,藉李陵之口,高談富貴在身——「富貴總欲,貧賤誰貪?陵如今受萬戶之俸,為一部之王;呼吸風生,吹噓翼颺。」「能跪單于,百年受貴。」又於《窮囚蘇子卿謹獻書於右効王閣下》中,藉蘇武之口,指稱李陵「背親向踈,無懷漢主之恩」、「婚單于女,受單于官,陷他人于溝壑」、「糧賜不均,處御不則,致使管敢背叛」等等,對照《史記》、《漢書》李陵其人其事的相關記載,《往還書》有諸多不符合正史的記載。其二,從敘事邏輯來看,如《李陵與蘇武書》中,先述「家世」、「先帝任命出征」,其後隨即插入「天奪人願、天喪我等」之段落,再敘「天漢二年相關戰役」,然與戰役有關的「無後救」一段,又書寫在更後面的段落,故情節安排不太合乎邏輯。其三,從人物形象來看,從忠君報國到貪生求榮的形象轉變劇烈,且對心路歷程的曲折變化,欠缺完整的描述,致使李陵前後判若二人,但缺乏關鍵的繫聯。其四,從勸降理由來看,李陵勸降蘇武的理由「人生百年,亦須達時遇世;富貴總欲,貧賤誰貪?陵如今受萬戶之俸,為一部之王;呼吸生風,吹噓翼颺。」言詞極為誇張,乃刻意突顯對李陵的負面評價。由這些缺陷來看,此文作者的程度不高,而論點亦失之偏頗,故王重民認為極可能是沙州學人的作品%,或許可信。

綜上所述,《李陵變文》、《執別詞》積極為李陵設詞、講唱其欲報又無奈的心聲,並認同其生命抉擇,都將李陵塑造為一個雄才偉略、能屈能伸、情感真摯、心存漢闕的落難英雄,表述「陵雖辜恩,漢亦負德」的抑鬱衷曲,內容傳承史遷觀點,以及班固為李陵確立的歷史地位。而於《李陵蘇武執別詞》中,蘇武的形象則不顯著,極可能與抄手省略前文有關。若從傳播的狀況來看,因兩變文為邊地將士們道出面對生死抉擇的心聲,故廣泛流傳於敦煌地區,其影響力不容忽視。至於在《往還書》中,李陵是位自豪家世、自負武功、自矜變通、自恃為王、勸降蘇武的匈奴右効王,而蘇武則有如傲霜枝般地凜然氣節,並痛責李陵不忠、不孝、不能守節等七大罪狀,襯托出蘇武堅貞不降的心志,直指李陵降敵即是叛國,抨擊的意味濃厚,雖說它對李陵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控,且其內容的邏輯性也不甚通順,然或許是河西漢人藉由批判李陵來表達心向大唐的一種聲音,也意味有另一股李陵現象(「非李陵們」)

<sup>90</sup>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頁 310。

同時在河西一帶滋長繁衍著。

## 五、結論

本文藉由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研究取向,探究自漢至唐不同文類文本所形成的李 陵現象,及其生命抉擇。由於文本的取樣廣泛,且透過諸多文人、將士、或講唱者的表述,激盪出許多「李陵們」與「非李陵們」不同的思維模式與價值判斷,分述如下:

就漢代史傳、〈報任少卿書〉而言,史遷認為李陵是欲以報漢的國士,班固更進一步將李陵的遭遇歸諸於「天命不遂」,足見李陵將兵之才德及其生命之抉擇皆深受漢代史家所肯定。然而,李陵事件牽涉的不僅止於敗戰降敵,還擴及武帝親私、君權高漲、群臣佞君、傳訊不明等諸多情況,這些現實的因素與班固所指的「天命不遂」實有密切的關聯,但當李陵面臨生死抉擇時卻未曾考慮過上述情況,而是反覆徘徊於降敵(貪生求榮)、死節(寧死不屈)之間,最後選擇了欲以報漢(屈辱苟活),卻不受容於漢武帝,最終成為悲劇英雄。對李陵而言,等待時機以報漢,藉此建功立業,完成個人的使命,此與貪生求榮的降敵、求取虛名的死節相比,應屬於更高的生命層次。而史遷受腐後,同樣選擇屈辱苟活,以成一家之言,足見史遷、李陵二人的內在生命價值都是為了實現個人理想以開創新局,故史遷甚能認同李陵的抉擇而仗義直言。換言之,從史遷對李陵的惺惺相惜中,實已微露李陵現象的端倪。

至魏晉六朝,士人們開始為李陵代言,且有李蘇並舉的情形,因而出現冠以李蘇之名的贈別詩、贈答書等作品。其中,李蘇贈別詩不脫別情的主題,而且具有普遍的適用性,此類詩歌也有增多的趨勢,顯示此一主題持續受到後人的關注而興盛不已。至於李蘇贈答書則將生離死別的情思描寫得更為具體而深入:李陵抉擇「欲有以報」而苟活;蘇武選擇寧死不降而滯留,突顯李蘇兩人皆有忠君愛國之心,但因面臨不同的生命遭遇,而有不同的生死抉擇,因此六朝文人為李蘇代言的詩文對

便寄予諸多的同情。至於在〈報李陵書〉中,雖出現蘇武認為李陵若能擇以死節「豈不休哉」的看法,但用詞和緩,為李陵投敵而抱憾的成份居高。整體的六朝詩文,對李陵其人其事的書寫偏重於離情別緒的議題,因其普遍受到六朝文人的關注,且多是同情的趨向,再加上諸多作品不排除有藉他人之事、述己之情的狀況,故可視六朝為李陵現象的醞釀期。再則,生存於政治紛亂的六朝人對於「求仁得仁」、陷蕃之苦,都有深刻的體會,甚或開始有藉蘇武之志為標竿,因而呈現李蘇(投敵與守節)對比的情況。

時至唐代,時空乖隔千百年來,文人對李陵的書寫形成兩極化的李陵現象:一則,認同李陵的「李陵們」,在詩歌方面,多以征戰沙場、重關塞斷的書寫情境來傳達離情、思歸的情意,擴增了六朝李蘇詩的書寫手法與範疇,且其咏嘆對象更為具體而明確。唐文方面,多引李陵事蹟以自況,並延續史遷得當報漢的觀點,而且那些積極認同李陵的作者(李陵們),都曾經歷過類似李陵般的生死困境,這也包括「地没戎虜而常蓄歸心」的河湟父老,以及眾多身在蕃地心在漢的陷蕃漢人,因而更能深刻體會李陵面對生命抉擇之無奈,並以李陵的抉擇為依歸,借李陵之口為自己發聲,道出個人的生命觀點、自我情志。甚至代表唐末官方立場的敕令也對李陵的降敵多所同情,形成廣泛的「李陵們」的現象。二則,嚴加批評的「非李陵們」,如白居易(〈李陵論〉),因為受到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所影響,以士大夫的氣節為生命職志,且未必真正面臨過如同李陵般的困境,故對李陵的抉擇未能抱持同理心,還藉蘇武守節的志向為標竿,將李陵降敵視為叛國的行徑,對李陵充滿苛責與抨擊,形成「非李陵們」的現象。

至於敦煌寫卷方面,《執別詞》充分反映了李陵與蘇武的友好交情,以及李陵身在胡地心在漢的心境。《李陵變文》則敘述李陵出生入死、欲報於漢、暫降匈奴、遭受誅族、歸鄉路斷等心路歷程,清楚呈現史傳對李陵的書寫。由於大唐時空,上述類似的內在衝突,生死兩難的抉擇,族群的去留取捨等現象,都經常發生於胡漢交戰的邊陲地帶,因此,藉漢言唐,藉由變文的廣布流傳,特別能夠反映敦煌將士面臨生死抉擇的心聲,以及邊地戰十滯留在外的思歸情懷,使不同時空的「李陵們」

可以找到認同的出口,促使「李陵們」的現象滋長漫延,足見這些李陵現象實未必僅限於一時一地。而在《往還書》,表面上是將李蘇二人做對比,視蘇武為忠君愛國的倫理典範,卻忽略李陵也有追求忠君報國的理想,且其內容對李陵降敵有諸多與史實不符之處,文意的邏輯性也不甚通達。然若深入考量敦煌的時空背景,唐末、五代時期,河西地區飽受外族勢力的侵擾,陷蕃漢人長期遭受高壓迫害,促使敦煌地區流傳諸多思歸唐室之辭,如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敦煌古往出神將」、〈感皇恩〉、〈獻忠心〉等,並有〈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作品,講唱敦煌人民心向大唐的情懷,故《往還書》二文或許也有藉由指責李陵之歸降匈奴,表達當時河西漢人心向大唐、企望回歸中央的漢族正統思想,而未必如王重民所言的「遊戲之作」。91

儘管前賢對《李陵變文》的成立年代,看法或有不同<sup>92</sup>,但無論是涉及突厥、回 體或吐蕃等史事,其背景皆與異族戰亂有關,亦與漢代匈奴犯邊的情形多所雷同。 在欠缺具體史證的情況下,《李陵變文》的創作年代未必僅限於敦煌陷蕃時期,或可 適用於其他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更重要的是,李陵的生死抉擇與去留抉擇,普遍 引起文人武士乃至社會大眾的關注,而有李陵現象的產生,正因為它所反映的不只 是李陵個人的人生遭遇,而是無數的「李陵們」與「非李陵們」的組合,這是歷代 無數軍民曾共同面臨的生命課題,也代表了多數文本作者們對生死抉擇的價值觀, 並可作為身居胡漢交界的前線將士們自我比況的人物典範。

<sup>91</sup>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頁 310。

<sup>92 《</sup>李陵變文》的創作時間,眾說紛紜:謝海平據突厥、默啜、突騎尸、九姓等語詞及其相關史料,考訂《李陵變文》應作於「垂拱年間至開元三年(685-715)」之間;羅宗濤推測《李陵變文》應出現於唐武宗會昌3年(843)以後;邵文實分別以節度、默啜、突騎施、吐蕃等相關史料,推測「《李陵變文》最早當寫於均有活動的開元時代。……變文中之突厥,實際上是在影射吐蕃」,而以為《李陵變文》「當是建中二年(781)吐蕃佔領沙州後」的作品。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60-63。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頁80。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收入季羨林等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頁77-79。

## 附錄:

漢	<b>唐李陵相關文本</b>	針對李陵的觀點或評價	文本展現的生命抉擇
漢	《史記》、	其一、李陵是具有「孝、信、	生死抉擇的標準,並不在於「貪
代	〈報任少卿書〉	廉、義、讓、恭、儉、忠」的	生怕死」或「從容就義」的二分
文		國家人才。	法,「屈辱苟活」反而是為了實
本		其二、陵軍原本不惜犧牲,準	現更遠大的抱負。
		備「死敵」的。	故司馬遷選擇最下腐刑,隱忍
		其三、朝臣對待人才的態度反	苟活,以成就一家之言;李陵降
		覆不定,且誇大李陵的過失。	敵求生,屈辱苟活,以待機報
		其四、李陵因能得人死力,故	漢,二人的內在價值與人生理
		士卒爭相死敵,有如古之名	想相互輝映,屈辱苟活的目的
		將。	都是為了再創新局。
		其五、李陵是「欲得其當而報	
		漢」。	
	《漢書》		其一、敗戰之初,面臨降敵或死
		其二、擴充陵軍英勇抗敵與轉	
		戰的歷程。	其二、降敵之後,加上武帝誅族
			陵家,李陵首度掙扎於胡漢歸
		處境與心境。	屬與去留的抉擇。
			其三、昭帝派人召陵時,李陵再
		的李陵相關史實。	度面臨是否滯胡的去留抉擇。
六	李蘇		詩歌表面傳達的是六朝人們對
朝	贈別詩		李蘇的共同意象,實則反映六
文			朝時空下,諸多文人滯北未歸、
本		人的離情與悲苦的心境。	身居胡漢而不得歸的心聲,不
			排除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
	-1		壘」的現實狀況。
	李蘇		其一、以李陵的視角,艷羨蘇武
	贈答書		歸漢、求仁得仁,卻痛心自身受
		時反映六朝人對李蘇事件的	
		看法。	其二、藉蘇武之口,為李陵投敵
			而抱憾,突顯二人不同的死生
			快擇。 ************************************
			其三、為李陵申言漢皇孤負陵
			心,使原本伺機報國的心意徹底紹致。不為帝原紹思は
<u> </u>		<b>宁公子子</b> 夕泽田未胜士平川	底絕望,而決意長留異域。
唐	唐   認同李陵者		積極認同李陵的「李陵們」,多
代立	代		身歷胡漢之戰或朝廷紛亂,內
文	詩		心皆有心向朝廷、待機報國的
本	文	乙烷,且多学穌亚舉;而唐文	理想,故面臨生死抉擇時,多以

			之作者則多藉李陵事蹟以自	李陵的生命抉擇(屈辱苟活以
			況。	待機報國)為典範,延續司馬遷
				得當報漢的觀點。
		批評李陵者	以士大夫的名行榮辱為立論	恥於李陵降敵的「非李陵們」,
			觀點,視個人未能死節為恥。	唯以「死節乃忠」為檢驗忠誠的
				標竿,但自身卻未必有身居胡
				漢的經驗,也未曾面臨類李陵
				的生死抉擇與困境。
	敦	認同李陵者	變文講唱者敘述李陵「先降後	講唱者反覆道出李陵面臨降
	煌		出」(降敵)為手段,達到「斬	敵、死戰的生命抉擇,以及不滿
	寫		虜朝天」(報國)的目的,為李	當權者辜負他報國歸家的決
	卷		陵降敵找到合理化的理由。	心,引發身居胡漢的敦煌軍士、
				落番之人的共鳴與心聲。
		批評李陵者	李陵化身為「自豪家世、自負	批評李陵的七大罪狀也是以
			武功、自矜變通、自恃為王、	「死節乃忠」作為唯一的抉擇,
			勸降蘇武」的匈奴右效王,使	或許是河西漢人藉由批判李陵
			蘇武痛責李陵不忠、不孝、不	來表達心向大唐的一種聲音,
			能守節等七大罪狀。	意味著另一股李陵現象(「非李
				陵們」)也在河西一帶滋長繁衍
				著。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東漢・荀悅:《漢紀》,臺北:鼎文書局,1977。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摩詰全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

唐·魏徵等纂:《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上海:文瀾書局,1902。

清·聖祖御纂:《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清·董誥:《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二、近人論著

丁宏武:〈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論李陵作品的流傳及真偽〉、《文史哲》6 (2017.12), 頁 19-40、163。

方祖桑:〈李陵、蘇武詩的探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11(1988.11), 頁 29-35。

王次灣:《南朝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0。

王偉忠:《白居易散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3。

王夢鷗:〈炙轂子及其詩格考〉、《幼獅學誌》16:2(1980.12),頁 55-73。

\*朱鳳玉:〈敦煌邊寨主顯講唱文學的傳播與軍旅情懷〉,《敦煌學》27(2008.2),頁

43-61。後收入《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頁 62-87。

\*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臺大歷史學報》26(2000.12), 頁 151-205。

吳澤炎等編:《辭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李丹和:〈校訂敦煌本《李陵蘇武往還書》〉,收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等編:《敦 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291-303。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7。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1996。

\*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收入季羨林等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71-86。

胡大雷:〈蘇李詩出自代言體說〉、《柳州師專學報》3(1994.9),頁16-18。

孫尚勇:〈論蘇李詩文的形成機制與產生年代——兼及《漢書·蘇武李陵傳》的成篇問題〉,《文藝研究》3(2012.3),頁 68-73。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張清華:《王維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章培恒、劉駿:〈關於李陵《與蘇武詩》及《答蘇武書》的真偽問題〉,《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2(1998.4),頁71-77、142。

郭在貽、黃征、張涌泉:〈《李陵變文》補校〉,《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1991.1), 頁 10-14。

陳其泰、趙永春:《班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黃水雲:《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趙逵夫:〈《李陵變文》校補拾遺〉、《甘肅社會科學》2(1991.2),頁89-92。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95。

劉國斌:〈關於李陵《答蘇武書》的討論與判斷〉,《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5(2011.10),頁110-112、128。

劉淑如:〈李陵答蘇武書辨偽〉、《臺北工專學報》6(1973.5),頁 393-394。

薛宗正:《邊塞詩風西域魂:古代西部詩攬勝》,鳥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 鍾來茵:〈〈李陵與蘇武詩〉作者探論〉,《漢學研究》12:2(1994.12),頁 229-243。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中華學苑》27(1983.6),頁 39-10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an] Ban Gu, Han Shu [Book of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Chu Feng Yu, "The Spreading and Military Mood of Singing Literature in Dunhuang Frontier Theme" in *Studies on Dunhuan* 27 (Feb. 2008), pp. 43-61.
- Huang Zheng & Zhang Yong Quan, *Dun Huang Bian Wen Jiao Zhu* [Proofreading Note of Variati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Juan Chih Sheng, "Ssu-Ma Ch'ien's Mind: An Explication of His 'Letter in Reply of Jen An' (Pao Jen Shao-ch'ing shu)" in *Historical Inquiry* 62 (Dec. 2000), pp. 151-205.
- Li Dan He, "Jiao Ding Dun Huang Ben *Li Ling Su Wu Wang Huan Shu*" [Proofread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 Ling and Su Wu, in Proceedings of Dunhuang] adopted 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of Hangzhou University, *Dun Huang Yu Yan Wen Xue Lun Wen Ji* [Dung Hua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thology]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pp. 291-303.
- Li Zhang Zhi, *Si Ma Qian Zhi Ren Ge Yu Feng Ge* [The Personality and Style of Si Ma Qian] (Taipei: Lern Book Company, 1997).
- Liu Da Jie, *Zhong Guo Wen Xue Fa Zhan Shi*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Hua Zheng Publishing, 1995).
- Luo Tzong Tao,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rmon Stories and Historical Stories in Tunhuang Ballads" in *Journal of Chinese Arts* 27 (Jun. 1983), pp. 39-107.
- Shao Wen Shi, "Dun Huang Li Ling, Su Wu Gu Shi Liu Bian Fa Wei"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tory of Li Ling and Su Wu in Dunhuang] adopted in Ji Xian Lin et. al, *Dun Huang Tu Lu Fan Yan Jiu* [Dunhuan and Tulufan Studies Vol.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1-86.
- [*Han*] Si Ma Qian, *Shi Ji*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Tse Hoi Ping, *Jiang Shi Xing Zhi Bian Wen Yan Jiu* [Investigation of Variati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Respect to History] (Taipei: Chia-Shin Cultural Foundation, 1973).